

剧变时代的渐进工作： 论纸质文史工具书的编纂及其意义^①

徐雁平

内容摘要：在工具性数据库快速发展的时代，纸质工具书将仍与之共存，并伴随发展。近二三十年古籍大量整理出版，学术研究不断拓展，经济实用的纸质工具书，有必要系统性地更新换代或创新品种。在纸质工具书建设过程中，个人编纂或小型学术团队编纂不但是一种稳妥、可把控的操作，而且还能保证工具书的学术水准和个体风格。就清代文史研究而言，系列纸质工具书的编纂，一方面可提供查检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对系列文献或集群文献的梳理，深化对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的“清代性”的认识。

关键词：纸质工具书 古籍整理出版 系列文献 清代性

引言

在未来较长的时段中，纸质书和电子书将并存，与此相应的是，纸质工具书和工具性的数据库也将共生^②。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史研究，是一个渐进的探索过程，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一锤定音的结果。优质的工具性数据库建设不易，远非采摘数据化时代“低垂的果实”那般突飞猛进；至于累积性更强、比“慢功夫”的纸质工具书的编纂，更是要苦心经营。工具性数据库不只是纸质工具书的升级版，它有自己的生长机制。纸质工具书除继承原有工具书体系之外，还要借鉴数据库建设的经验和技術，从而创造出新品种。当然，不是每位学者都要编制工具书，但总得有人去投入、实践。工具

①本文所论纸质工具书，限定在明清文史范围，且以笔者较熟悉的方向略作展开。

②若将目录、辞典等视为不同形式的清单，则清单或清单形式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化中很早就存在，按照艾柯的话来说，清单在现代世界和后现代世界里照样会出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摆脱不了没完没了的清单”（[意]翁贝托·艾柯编著，彭淮栋译：《无限的清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书既有基本的查检功用,又能深度揭示某一类文献的蕴藏,指示潜在的探索方向,还可在一砖一瓦的累积中练就研究者的文献意识和学术史意识,这或是所谓的“练手感”。在快进、剧变的时代,追求研究的日新月异和显示度时会忽视小步慢跑的寸进之功。纸质文史工具书的编纂与系统建设,是维持快进时代学术研究稳定性的基石之一。

纸质工具书有其独特的信息展示方式,能在与人的手、眼和记忆互动之间逐步建立亲密关系。二十多年前我曾依据系列《国学论文索引》分段了解晚清到抗战前国学研究进展^①,并利用该索引在旧期刊库中将所著录的刊物基本翻阅,因而对上世纪前三十年间的相关刊物有接触体验。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与王重民、杨殿珣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给我震撼和启示,前书从早期中日译书书目数据对比中揭示中日文化交流的起落^②,其深刻性和直接性至今似无其他论著可以超越;后者的分类系统新旧杂糅,套用艾柯的话来说,是编纂者所列的“庞杂的清单”。类目的庞杂与指示内容的丰富,构造出一种纷纭、充满生机的图景,与《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的“构图法”大不相同。《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庞杂,反而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想象,这或许暗合艾柯论清单的“实用性”同时要伴随述说清单的“诗性”。每一种纸质工具书或许就是“实用性”与“诗性”的结合体。

一、文献涌现、研究拓展与工具书的系统建设

工具书是管理文献的一种方法,文献情况发生变化,工具书必随之变化。近几十年大型古籍影印丛书出版颇丰,就“四库系列”而言,有面向14种丛书的《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可以并合查检,方便利用。在“四库系列”之外,还有诸多大规模的古籍影印丛书,如何检索并了解整体情况?南江涛、贾贵荣编有《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

①北平北海图书馆编目科编:《国学论文索引》,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北平图书馆编纂部索引组编:《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中国图书馆协会,1931年。刘修业编:《国学论文索引三编》,中国图书馆协会,1934年。刘修业编:《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中国图书馆协会,1936年。最近查目录,才知还有侯植忠编《国学论文索引五编》,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1955年油印本。

②谭汝谦在《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代序)》中指出:从1660-1895年,日译中书129种,中译日书12种;从1896-1911年,中译日书958种,日译中书16种(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5-57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收录1949年至2010年60余年间的新编古籍丛书440多种,涉及子目近5万条。此书价值突出,然未能宣传推广,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此外,2011年以后,国内影印古籍丛书呈井喷状态,大致以平均每年涵盖2000种以上子目的速度增长,如《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500册,2016年)、《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600册,2017年)、《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240册,2019年),还有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系列,以及诸如《山东文献集成》《江苏文库》《广州大典》之类的地方文献系列丛书,相应检索工具如何适时跟进予以反映?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网站介绍,“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查询数据库”即是在《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基础上建设,二期将陆续增加民国时期以及港台出版的影印古籍丛书,并更新近年数据^①。然而,由于数据库是商业产品,定价是图书的数十倍,并且不对个人销售,一般学者、馆员和读者基本上无法利用。从这个角度讲,纸质工具书更新的代价低很多,更方便一般读者,其优势并没有被数据库替代。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出版,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如何避免重复出版、提高丛书利用率,仍有待探索,整合性的、不断更新的多途径检索古籍数据库也亟待建立;同时,《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之类的工具书也要定期增订出版,发挥切实作用。

从大型古籍丛书转到大型人名辞典,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华书局七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具书,最晚出的李时人编著的明代卷,2018年出版。这套辞典收录作家的标准是宋以前选择从宽,元明清则从严。明代卷是从有作品存世的2万作者中选出3046人,而清代卷收录3124人,近代卷收录950余人。因为有编选体例在先,所以明、清及近代文学家以此等规模呈现,也是合理的。然若从近三十年明清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至少清代卷、近代卷的容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查检的需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出版说明”开头即宣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一代之文学乃由为数众多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所构成。”^②作家数量也是研究一时代文学风貌的维度,明代卷、清代卷统一用3000多位作家作为量度,其学理依据似可商榷。因为学术研究的拓展、文献的扩充使用,有必要增订或重编明、清及近代文学家大辞典。单就一种文体而言,据南京大学文学院《全清词》编纂室提供的数据,清代词人已超过1万人。《全清词》“咸同卷”

^①2022年8月15日首都师范大学南江涛提供关于“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查询数据库”以及关于私家藏书目录影印材料。

^②李时人编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将于2024年出版,“光宣卷”编辑工作已启动^①。《全清词》整体出版之日,则一部名为“清代词人辞典”的工具书可以问世,有清一代的词学盛况借此显示;以此为依据,还可以从一个侧面补充七卷本大辞典系列中清代卷、近代卷收录人物的不足。

七卷本文学家大辞典因其要重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整体风貌,在体例上不得不作“均衡性”考虑;然在此之外,还可采用地方视角,充分发掘地方文献资源,编纂相对全面的地方性工具书系列。在这方面,早期《江苏艺文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起陆续出版)是一成功之例,为后来诸多工作起到铺垫作用。与《江苏艺文志》相应的是王绍曾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齐鲁书社,1993年),后来山东省“艺文志”的编修,山东藏书史、刻书史、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乃至《山东文献集成》的编辑,皆得此书沾溉。工具书分工不同,各有天地。地方性工具书对全国性、通代性的工具书有拾遗补缺之用。诸如《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广西历史人物大辞典》《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扬州历史人物辞典》等等,所录人物更具地方性和基层性,往往是查检工作的“最后一站”,不可缺少。嘉兴号称人文渊薮,在明清文史研究中可作为“典型区域研究个案”(另外一典型,当为桐城县),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已经标示嘉兴非同寻常,而民间学者龚肇智多年深耕,出版《嘉兴明清望族疏证》(3册,方志出版社,2011年)、《嘉兴明清望族续记》(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2018年),更揭示其地人文脉络之丰富。近年72册《携李诗文合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收录嘉兴地方文献“携李文系”“携李诗系”的相关典籍十三种,实现珍稀稿抄本文献的合璧出版,共收录6907人^②,这一汇合性的地方总集为此前《嘉兴历代人物考略(增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文学人物部分的再次增订提供了文献依据。

文献的批量涌现与查检的需要,是工具书编纂和更新的动力^③。王重

①据南京大学文学院冯乾2023年8月4日提供信息。

②此数据由嘉兴图书馆郑闯辉2023年8月11日提供,他为《携李诗文合集》的作者和篇名编制过索引。

③叶晔为《明人年谱知见录》一书所作序言中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工具书,理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来认识并使用互联网、数据库等新技术的力量,实现纸质书籍与电子检索的并行,甚至让年谱目录的修订工作处于长久的进行时态。”(汤志波、李佳琪编:《明人年谱知见录》“序”,中西书局,2020年,第5页)叶晔所说,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目前较可行的两种形态的工具书共存,是数据库及时更新,纸质工具书最好十年内增订一次。

民、杨殿珣等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由北平图书馆 1935 年出版(当时编辑者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中华书局 1965 年重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再次重印。该索引著录 428 种清人别集、12 种清人总集中的文章篇目,依据文章内容分为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大类,每大类之下,再按主题细分。这 400 多种著述虽然数量不多,然较具代表性,按篇目归类所标示的一些趋向,往往就是清代学者比较重视的问题。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查检,可能发现具有清代特色的问题,如“十一地理类”“十五金石类”下类目之细与相应篇什之多,足见这两种类目所示是清代显学;“诸子类”下“八艺术类”列“图记”,“图记”下细分为传经、课读、读书、校书、藏书、访古、尚友、雅集、话别等 16 小目,这些分类图记皆是艺术史和文化史、学术史、文学史的交叉研究新题目;“诸子类”下“十六杂论”下细分 29 个小目,其中有常见话题如天、人、道、理欲、心志等,也有较有时代特色的士、师、友、公私等话题,以此处所列举诸主题,再联系赵园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梳理一下当时读书人议论较多的话题,可与索引所列重点问题作一呼应。彼此能呼应,既说明这些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暗示如何从众多文献的重叠中发现“内在的”、真正属于那个时代的问题。

《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所收录 400 多种诗文集还不能较全面深入探求清代社会文化诸问题,举例而言,赵园所读明清之际文集多于“索引”所选择,所以她发现的问题更深刻、更准确。若将“索引”所收录文集扩充数倍数十倍,类目设计更精细准确,其揭示和指引效果又将如何?北京大学中文系“新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风闻即将出版,想必一定从文献方面更新研究者对清代的认识;近似内外配合,与“新编”这一大书配套的还有杜泽逊主编《清人著述总目》(中华书局),著录清人著述 22 万种,这种前所未见的书目数据与类目框架,当是日后研究更高、更宽大的平台。

从规模较大的工具书转到小型专题工具书,以“书目之书目”为例,看工具书更新换代的必要与可能。清代私家藏书之兴盛,远逾前代。据范凤书统计,清代藏书家有 2082 人^①,然诸多私家藏书中,有多少有藏书目录在世?似无法说清。来新夏曾表示,“《中国历代目录提要》分清前、清代及清后三部分编写。本书为清代部分,题名《清代目录提要》”^②,以京、津、沪、宁、苏五地主要图书馆收藏为主,收录多种类型目录(如其中有金石目录、法帖字画

①范凤书的中国历代私家藏书统计数据是:宋以前 253 人,宋代 738 人,元代 207 人,明代 897 人,清代 2082 人,近现代 868 人(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67 页)。此处统计数据中,近现代人物当有一部分属于清代。

②来新夏主编:《清代目录提要》“凡例”,齐鲁书社,1997 年,第 1 页。

目录)380余种,其中清代私家藏书目录有141种。这一数目当然十分有限。目前所见集中著录私家藏书目录较多的是《中国古籍总目》,据侯印国统计,约有540种,然此“总目”所录书目数据源自国内几家大图书馆,仍不全面。侯印国在“总目”之外,补录见存私家书目近300种^①。清代私家藏书目录对研究清代学术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如学术风气变迁、地域文化、文献文化史、学人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家族文化传承等等,皆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内涵丰富的“收藏清单”与其他记载结合,可推进更具体的研究。“中华古籍稀见书目书志丛刊”是在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著名图书馆藏稀见书目题跋丛刊”基础上优化而来,收录入选馆所藏稀见书目、题跋、金石目录,要求均为首次公开出版,选录标准严格。截至目前,陆续出版了福建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等五家藏书机构的350多种稀见书目书志,但这些也只是各图书馆所藏部分私家藏书目录,若再以各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查检,可以扩充840种私家藏书目录的涵量。当然,既要重视图书馆藏书,还要注意博物馆、档案馆系统中收藏的、暂未公开书目信息的私家藏书目录。在这三大系统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线索可追查,如同治元年(1862)四月浙江平湖人沈筠在南汇避乱时,据记忆编写《守经堂补亡书目》《未刻诸稿》,共收书204种,这一书目除记录地方文献外,还有不少在嘉兴府一带流行的小说戏曲,也有中日交流文献。此书目前极少有人论及^②。合并诸多收藏和记载,精心整合,应可编纂出可观的“清代私家藏书总目”。以此类推,还有其他种种工具书有升级或新创的可能。

二、个人或二三同道编纂工具书的可能性

大型工具书,如笔者常用的《清人别集总目》等,肯定要有编纂团队才能及时完成;而一些中小规模的工具书,如《清朝进士题名录》之类,则完全可由个人或二三同道合作完成。这类中小规模工具书,其编纂者在5-10年间能作精细处理,对文献整体情况及内部诸单元的轻重、细节作用的大小皆有把握,因而对框架设计、类目设置皆心中有数;编纂时,还能融合编纂者对这一专题文献的见解或设想。因为能融合一定规模的数据与主要编纂者的学术体验,这样的工具书尽管有不足之处,然更有个人风格。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是研究清代文史的必备工具书,收录人物多达2.5万人。因为各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以及文献的拓展运

^①侯印国:《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3页。

^②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6-237页。

用,如朱则杰的清诗考证、鲁小俊的清代书院课艺研究、张剑的清代人物官年实年研究、陈鸿森的乾嘉学人系列研究等等,为“生卒年表”的修订与增补提供新成果或新线索。笔者近期就“生卒年表”增订问题请教江庆柏,得知他一直在留意相关成果或新出文献,拟增加三千余人,形成可查检接近三万人的增订本。

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的成功经验来考察,可发现江庆柏编纂工具书,已经形成一种深入拓展、顺势延展的研究思路。或是因为他参与过《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的编纂工作,对其中作家传记材料有掂量、考订的经历,故能较充分地利用此书以及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等著作,聚焦生卒年考证,光大钱大昕以来“疑年录”研究学术传统。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专攻一代人物生卒年而言,也是对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突破与发展。考订清代知名人物生卒年,必包括相当数量的举人、进士;而《江苏艺文志》的编纂也是一个触发点,也要涉及清代的进士。江庆柏说:“在做《江苏艺文志》的时候,看到江苏的进士特别多。当时我们常用的一本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那本书它有明有清。后来我想把清代部分的单独整理一下。”“当时自己的基本想法是要把国内现存的清朝进士题名文献都看到,在此基础上作一个全面的校勘。书中使用的清朝进士题名文献包括硃卷、小金榜、题名碑、会试录、登科录、履历便览、齿录、题名录、地方志中的‘选举志’等。”^①三册《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因为研究的推动,顺势而成。从此书卷首所录《清朝进士题名文献概述》长文及每科之后的“校记”,可知此书可以取代或者说超越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新1版)中的清代部分。

调整视野,转向地方,江庆柏在江苏地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也成果累累。因为他早年参与《江苏艺文志》(赵国璋主编)的编纂工作(后来又主持全面修订),对江苏地方文献有系统梳理。他在前后的编纂工作中,感觉到这一地方文献总目只著录历代江苏人的著作,而许多写江苏历史地理文化的著作未被收入,故后来斟酌,由“江苏人写的书”转为“写江苏的书”,编著《江苏地方文献书目》(增订本改题《江苏地方文献志》)。两种大型工具书配合,江苏文献的整体性得以充分揭示。以两种书目特别是《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为基础,江庆柏主持《江苏文库·史料编》工作(属于“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也就很有成效地展开。专门的书目调查与工具书编纂也参与当下社会文化建设。

^①2023年7月25日、8月5日笔者就江庆柏所编系列工具书,先后两次向他请教。

因为研究的需要而促进基础文献建设的学者,在老辈学者江庆柏之外,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汤志波的工作很有计划和规模,他主编的《明人研究基础文献丛刊》已出《明人年谱知见录》(与李佳琪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明别集整理总目》(与李嘉颖合编,中西书局,2022年),其中《明人年谱知见录》收录明人年谱2106种,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形成新组合。《明别集整理总目》收录1912-2020年出版的明代别集约1.6万种(其中影印本1.4万余种),从其附录一“影印丛书简目”可知该书对大型古籍丛书所收书目数据的发掘。汤志波主持的规模更大的《明人碑传索引》《明人别集叙录》正在分卷编写和出版过程中^①。预期在未来十年之内,如汤志波所愿,“明人研究基础文献”系统可以建立。

上文所举江庆柏、汤志波等已经出版或正在编辑的工具书,可归纳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结合了专题学术研究。这些工具书所涉及的范围、工作量基本可以控制,有可操作性;最终形成的结果,也有整体感。这类工具书,不仅仅是方便“管理专题文献”,更重要的是能建立某一文献或主题的脉络,或者说有助于形成学科意识、流派意识,如无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则桐城派的边界就很模糊;如建立日记学,则要有“清代日记总目”之类的工具书作为支撑。这里所说的整体感,尤其是针对个人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对专题的感觉,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手感”。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因为有不少以专题文献整理作为主要内容的重大研究项目,为编纂新工具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编工具书中发展出的整体感,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专题文献在整个文献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分量,所谓“在整体中”;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文献与其他文献的关系,所谓“在与其他关联中”;三是所研究的专题文献中,要掂量哪些是关键、更有价值的单元和议题,所谓“在内部比较中”。研究者编纂工具书,就是在编纂的过程中形成对问题的整体感的同时培育出对问题重要性的感知。

三、文史工具书的新品种与“清代性”的探求

根据实存文献编纂新型工具书,揭示清代文献与前代的差异,进而探求清代文献的清代特性,或是编纂新工具书的一种努力方向。

上文所论《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就是一种创新型工具书,因其深度发掘文献,指示众多有价值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索隐显微”。还有一类工具书,此前各代略有萌芽影迹,然因风气未开和读者限于识见,便少有全面梳理,因而未能结构成型。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①2023年8月4日华东师范大学汤志波提供他所编明代文史工具书信息。

年初版)是第一部全国性的通代女性艺文志,成为中国妇女史、女性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编纂,其时已有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1922年)、单士厘《清闺秀艺文略》(1927年)问世,稍后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1941年)出版。胡文楷在施、单等人著述基础上广搜博采,所收录有著述的女性按时段统计:汉魏六朝33人,唐五代22人,宋辽46人,元代16人,明代近250人,清代3660余人^①。清代女性作者数量与前代的差异,自然可视为清代女性文学兴盛的表征。这一专题目录显示的朝代之间的落差,还可与其他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新工具书所提供的数据联系考察。以家集为例,目前所知家集第一次以类目名称出现是在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二中,然一直无专门的家集目录。笔者编著的《清代家集叙录》对各代家集数量有如下统计:唐前8种,唐五代8种,宋代29种,元代17种,明代193种,清代1244种^②。姚蓉近年研究明清唱和诗词全集,将有《明清唱和诗词集叙录》出版,她提供历代存世唱和诗词集数量:晋代2种,唐代33种,宋代17种,元代54种,明代182种,清代836种^③。其他已初步成型或已出版的新型目录,有鲁小俊的《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2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收录存世课艺196种,近又访查补充,预计增订本“叙录”将收300余种课艺。此种文献前代未见,清代独盛,鲁小俊利用自编目录编选《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清代书院课艺珍本丛刊》,充分展示了这一类文献的价值^④。张剑先后整理过《翁心存日记》《莫友芝日记》《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策划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后又主持“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他的研究计划中有阶段性的“近代日记叙录”和整体性的“清代日记总目”,据调查,近代日记存世者有1100余人,而整个清代约有2000人日记存世^⑤。清代日记的整理出版已经影响到史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经整合形成的“清代日记总目”将呈现这一文献或文体的全貌。有此总体书目数据,单种日记的

①张宏生、石旻:《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价值和意义》,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06页。张宏生等增订元代1人,明代5人,清代247人,不在以上统计数据之内。

②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页。此统计包括存世和被著录的家集。

③2023年8月5日上海大学姚蓉提供数据,亦见《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前言”。

④2023年8月5日武汉大学鲁小俊提供数据。

⑤2023年8月3日北京大学张剑提供数据。

特性和价值就可获得比照、阐释的框架,也有助于展开对清代日记分布时段、空间等方面的分析。女性著述、家集、唱和总集、书院课艺总集、日记等专题书目,还有更早的书目如蒋寅的《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以系列骤升的数据,勾勒出清代在文献或文化等方面不同于前代的诸多面相,或者在专题目录或专题性数据集合中进一步明晰清代文献文化的“清代性”。

当然,“清代性”也不是一个固定封闭的概念,清代、近代日记的书目数据,可以启发一些思考。在关于“自我建构”的理论中,记日记是一种连贯的叙事行为,以近似自传式的日记写作维持完整的自我感^①。清人日记有不少是流水账式的备忘录,但也颇有用心之作,是否可以发掘出一种“自我认同”的日记叙事?写日记是一种“很常见的人文主义习惯”,“写日记,看日落,多聆听自己的内心,和密友谈心,读歌德的作品”,是人文主义指导与建议的内容^②。此处不能勉强将清人日记与“自我认同”建构及人文主义习惯相勾连,但作为连续的历史,尤其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日记作者而言,以日记个案研究与书目整体数据作为依据,研究者可作出一些有现代意义的推论,而不是在造空中楼阁。

清代文献中可以催生出或“发展出”众多新工具书,此类“开列清单”式的编纂之举不能简单视为“给事物一个形式的欲望”^③,而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探求文献、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方式。

四、结语

安·布莱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热心抢救和整理文献,导致汇编著作迅猛增加,“印刷版汇编作品的编者声称,他们把各个方面的信息集中起来,满足读者大众的兴趣(他们认为大众兴趣的多样化是正常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了公共利益。汇编规模和资料范围的扩大又反过来导致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检索方式的出现”^④。将我们近几十年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出版以及密切相关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视为本土的“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可能略有不妥,然此种趋势会“导致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检索方式的出现”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夏璐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②[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52页。

③[意]翁贝托·艾柯编著,彭淮栋译:《无限的清单》,2013年,第245页。

④[美]安·布莱尔著,徐波译:《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3页。

这一说法,应该没有问题。纸质文史工具书的建设,在剧变时代迎来新机遇。

所谓新型工具书只是相对而言,它只是文献或知识体系中未被充分注意或暂时被忽略的部分,没有被界定、整合、强化,现在需要将其“问题化”,并推助其发展、进化为自成体系的板块,以集合的方式显示专题文献的内蕴和价值。诸多新工具书的编纂,既可将文献或知识的版图中若干板块“浓墨重彩”,也可在标示多样性的同时,在专题文献的系列中看到更多关联。

工具书一方面在客观揭示历史存在,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暗示可能的创新或再生产。工具书在设计或编纂时,当然会有较为具体的目标或者用途;然工具书编成之后,进入到流通和传播的过程中,则不必完全为初始的目标和用途所限定。工具书内部条目的累积、汇集,如同水库贮存的势能,会在不同情形下有多种转化的可能,这些潜在的可能赋予工具书更多的生机。

【作者简介】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文化、清代文献学。

本刊启事

一、为及时充分反映文献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刊编辑部的实际情况,自2024年起,每期增加一个印张,即16页。

二、自2024年起增加电子邮箱投稿方式,投稿邮箱为:wenxian@nlc.cn。鉴于文献学研究成果对特殊字库的使用需求普遍较高,建议在使用邮箱投稿的同时,一并寄递纸质文本到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邮编100081),电话:010-88545562。

《文献》编辑部